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于洁, 李红绿

(怀化学院 外语系,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要: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 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 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 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 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关键词: 权力话语理论; 翻译观; 胡适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6-0075-03

On Hu Shi's Translation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YU Jie, LI Hong-lu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u Shi's translation ideas from Michel 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As for the choice of source texts, Hu Shi advocates translating the west masterpieces; as for the choice of target language, he insists on the u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as for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methods, he emphasizes the adoption of literal translation. Hu Shi's translation ideas are the manipulation results of power discourse. They are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power discourse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literature revolution, forceful west culture and so o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ursuit of personal poetics.

Key words: theory of power discourse; translation; Hu Shi

美国学者勒夫维尔(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 原始资料集》中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连串疑问: 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引进外国文本? 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了外国文化中的文本? 为什么以外国文本为基础来制作文本, 而不是直接先以自己的母语来制作类似的文本?^{[1]161}勒夫维尔这一连串的拷问只有超越单纯语言形式对等的范畴, 通过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译者的诗学追求等各种权力话语因素的分析才能找到答案。胡适似乎有着勒夫维尔同样的学术旨趣。他围绕翻译问题提出了系列观点。在翻译题材上提倡选译西方名著, 在翻译用语上主张选用白话, 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2]68-72}。如果套用勒夫维尔的问句反问一下, 胡适为什么提倡选译西方名著? 为什么主张选用白话翻译? 为什么强调选用直译的方法

翻译? 是哪些因素左右着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离不开对其翻译活动背后各种权力话语因素的分析。笔者拟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角度探讨胡适的翻译观, 力求将隐藏在其翻译思想背后的权力话语因素推向前台, 从而阐释这些因素是如何促成其翻译思想的。

一、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强调话语是一种权力, 人受其支配, 称: “不是人在说话, 而是话在说人”^{[3]476}。在他的许多著作中, 福柯对权力和话语都有过论述。1960年, 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指出文艺复兴之后疯人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失语, 成为沉默的“他者”, 是因为他们被理性压迫, 被剥夺了权力^{[3]475}。1972年, 福柯在其演讲《理论与刑罚制度》中探讨人为什么受制于语言时提出了“权力/知识”理论, 指出“权力产生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互相指涉的”^{[3]480}而话语则“既可以是

收稿日期: 2009-11-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08C654)

作者简介: 于洁(1963—), 女, 山东威海人, 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4]381}。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福柯的“权力”就是“话语”的权力;“话语”是“权力”的话语,两者不可分割。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它们就像一种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福柯看来,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实质”,可以说“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就有多少种权力关系”^{[3]480}。因此,权力也存在于翻译活动之中,对其实施操控。美国学者勒菲弗尔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和重写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patronage)。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5]14-15}。显然,勒菲弗尔的“翻译外部因素”与“社会机制因素”相关,它构成了操纵翻译活动的外部权力话语;而“翻译内部因素”则与“译者及其它专业人士的因素”有关,构成了操纵翻译活动的内部权力话语。因此,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活动中主要表现为翻译外部权力话语和内部权力话语对翻译活动的操控。翻译的外部权力话语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相联系,而内部权力话语则主要与译者的诗学追求相关^{[6]55}。通常说来,内部权力话语处于隐性的地位,常常要服从于同时发挥作用的外部权力话语。这也是勒菲弗尔“最关注更大的语境,历史和文化传统(convention)”的主要原因^{[7]127}。翻译实践表明,越是处于宏观层次的选择,如翻译方法、策略的选择,越是明显地受到外部权力话语的影响与制约,而在微观层次的选择中,如具体到每个句子的措词,虽借助于宏观层次的外部因素,能够发现支配实际操作中的每一个选择的内在目的,但是受译者个人的影响更大^{[8]27}。新文学时期,胡适提出的翻译选择观既受到当时特定文化权力话语的影响,也与他个人的诗学追求有一定联系。

二、胡适的翻译文本观

翻译文本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翻译活动的价值和成败^[9]。胡适对翻译选本独具慧眼。1918年4月,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的名著翻译观^{[10]57}。

胡适选译名著的翻译观与当时国内文学革命的权力话语紧密相关。新文学运动时期,传统文学不被当

时的青年学子看好,与西方文学相比,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不能吸引中国当时的广大青年人,失去了话语权。而西方文学由于译介,开始为国人所熟悉,在国内已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胡适先生肯定西方文学的成就,主张取其精华发展传统文学。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10]55-56}。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学已经处于弱势阶段。

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在分析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时指出翻译文学在下面三种社会语境下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第一种社会语境:当一种文学还很年轻(young),尚有待确立的时候;第二种社会语境: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peripheral)或弱势阶段(weak),或既处于边缘也处于弱势阶段的时候;第三种社会语境:当一种文学正经历危机(crisis),或出现了转折点(turning point)的时候^{[11]116}。

由于传统文学逐渐没落,“正经历危机”,中国文学出现了转折点,翻译文学走向了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伴随翻译文学的中心化,翻译选本成了当时译者考量的焦点。埃文—佐哈尔认为,“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是取决于多元系统的状况的,除了看作品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译语文学中能否扮演所谓革新的角色”^{[12]118}。胡适顺应时代诉求,提倡翻译西洋名著。这种名著翻译观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内文学革命的权力话语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三、胡适的翻译用语观

新文学运动时期,白话文与文言文两种权力话语极端对立,当时的青年激进派主张使用白话文而守旧文人却仍坚持采用文言文。胡适认为翻译必须使用白话。一方面,他通过分析周氏兄弟古文译作《域外小说集》失败的原因,对文言翻译的末路进行指证,称,“用古文译小说,……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13]216}。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考证,从中国文学进化史的角度为白话翻译开路,指出:“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14]14}。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使用白话翻译。

胡适提出的白话翻译观是白话与文言的两种权力话语发生转变的结果。作为中国旧文人的权力话语,文言曾经是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已经僵化腐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中心话语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质疑。而白话虽然曾是中国社会的边缘话语,但由于它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富有生命力,从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响应,逐渐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扮演着“创造新文学的‘工具’”^{[10]50},成为文学革命派的权力话语。文言和白话在五四前后的交锋中经历了彼消此长的“交错演化”过程。作为巩固或变革文化的工具,翻译也毫不例外受制于这场权力话语交锋的影响。随着白话逐渐在中国社会占据中心,翻译活动也在这一权力话语的制约下开始由文言翻译向白话翻译转变。胡适先生的白话翻译观反映了文言话语权向白话话语权转变时对译者选择译语所产生的影响。

胡适提出的白话翻译观也反映了他个人的诗学追求。自留美以来,胡适受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必须向西方学习。胡适对新文学的诗学追求反映在其翻译思想上就是希望通过白话翻译引进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以变革中国传统文学。五四前后,国家还处于分裂状态,对话语权控制不够严密,胡适可以实现自己的诗学追求。他可以根据自己认可的诗学观选择翻译用语。此外,外语的口语化特征与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诗学主张不谋而合,这也是胡适主张白话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胡适的白话翻译观也体现了他个人的诗学追求。

四、胡适的翻译方法观

胡适提倡直译的翻译方法。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中对周作人直译的翻译方法表示赞赏:“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和口气”^{[13]257}。胡适的“直译”观受中西文化权力话语的影响极大。译者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使者,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原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两种文化的折中点上。如果译者站在第一种文化立场上,他往往会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如果译者站在第二种立场上,他可能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如果译者站在第三种立场上,他则可能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的方法,采用折中的方法翻译^{[15]66}。因此,译者对文化立场的选择操纵着他对翻译方法的选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罗马译者在对待希腊文化的立场发生改变时译风的转

变。罗马人在征服希腊人之初,认为希腊文化高出他们一筹,“希腊的作品为罗马的译者奉为至宝,因而在翻译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16]18}。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不再认可希腊文化,于是“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ibid)。胡适对翻译方法的选择也受到他文化立场的影响。胡适早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多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谈翻译,主张采用“意译”——“归化式”的翻译方法,如“他(胡适)早期的诗歌翻译几乎无一例外全都使用五七言古体”^{[17]75}。但自留美以后,他受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影响较大,崇尚西方文化,多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谈翻译,主张“直译”——“异化式”的翻译方法。廖七一先生认为,“胡适的白话翻译始于1911”^{[17]76},刚好发生在他留美(1910-1917)学习后不久。胡适译风的转变反映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两种权力话语对他翻译方法的操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主张彻底的“全盘西化”。1929年,胡适在《基督教年鉴》上刊载的英文稿《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中表明了他全盘西方(wholesale westernization)的文化主张,指出“西方近代文明在精神方面是科学,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是理智化、人化、社会化,在物质上是机械化与电气化,欧洲18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都高出东方文明”^{[18]286}。由此可见,胡适主张西化的文化立场是西方强势文化话语操控的结果,是他对传统文化权力话语与西方文化权力话语权衡后所做出的选择。他的这一文化立场操纵了他对翻译方法的选择。

五、结语

笔者运用权力话语理论探讨了权力话语因素对胡适翻译选本、翻译方法、翻译用语等方面的操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遇到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情况,必须在一系列的选择中作出一个选择”^{[16]202}。译者这种抉择无时无刻不受权力话语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是操控译者选择的外部权力话语,而译者个人的诗学追求则是决定译者选择的内部权力话语。外部权力话语似“一只看不见的手”^{[19]16}影响着内部权力话语。胡适对新文学的诗学追求受制于当

(下转第85页)